

微观史学的理论视野

邓京力

摘要 近年微观史学研究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史学理论与方法发展的某些新趋势。一方面,以个体化、事件性、区域性、叙事化为表征的微观历史写作展现出抵制简单真理与解构宏大叙事的创新力;另一方面,也触发了有关历史学碎化的种种争议,似乎微观史学与宏观历史之间天然铸就了某种不可逾越的矛盾与隔阂。然而,事实上真正成功的微观史研究总可以从不同规模、多重维度、各类语境中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从而发掘出社会史与文化史相融合的通道,结构性、长时段与全球化过程具体化的路径。

关键词 微观史学 宏大叙事 后现代主义 历史叙事 全球史

DOI:10.16240/j.cnki.1002-3976.2016.01.019

学界通常认为微观史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达到鼎盛期^①。最初微观史学经常被归入更着重于对人们过去经历进行文化阐释的“新文化史”范畴,甚至被视作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领域的某种表现。本文试图结合当前国外有关微观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讨论,在国内史学界广泛注意到历史学碎化的问题和争论的背景之下^②,探讨在历史领域中微观研究所应具备的宏观视野,以及基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所应思考的微观维度。

一、微观史学兴起的现实与理论语境

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一方面将微观史学的兴起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质疑、历史学对结构性的批判和对个体的强调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称微观史是相当意大利式的主题,可能是其乡土观念或怀旧情绪的体现^③。但对于很多意大利

微观史家而言,上述论断却代表了西方史学界对微观史学的某些误解^④。

首先,在他们看来,微观史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兴起与意大利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背景有密切关联。60年代后期,意大利左翼进步势力在面对从保

① 国内有关微观史学的研究,参见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周兵《当代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周兵《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朱定秀《卡洛·金兹伯格微观史学思想述评》,《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吕厚亮《试析当代西方微观史学的若干特点》,《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俞金尧《微观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历史教学》2011年第12期;王传奇《微观史学对历史研究的利与弊》,《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8期等。

② 参见《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上、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期。

③ Peter Burke, “The Invention of Micro-history”, *Rivista di Storia Economica*, Vol. 24, 2008(3).

④ 乔瓦尼·莱维:《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尚洁译,《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

守主义复辟到恐怖主义袭击时所表现出的软弱无力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他们对于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理解的简单化、空洞化,这一点也反映在历史编纂中。于是,有些意大利史家包括爱德华多·格雷迪(Edoardo Grendi)、卡洛·彭尼(Carlo Poni)和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等人,开始质疑概念化、结构化的总体史和固化因果分析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逐渐放弃了概略性和普遍化的解释模式,回归到历史的复杂性分析。因而可以说,微观史学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领域对简单真理的反抗,是复杂性研究的复兴。

其次,微观史学也不是意大利史学家所特有的研究主题。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 E. P. 汤普森、美国史家娜塔莉·戴维斯、法国史家勒华拉杜里等的研究都代表了这一趋势。而在世界各国,微观史学研究也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德国微观史学的代表主要是日常生活史学派,中国的微观史书写则大多出自区域社会史与文化史领域。在《什么是微观史学:理论和实践》一书中,作者 S. G. 马格努森和 I. M. 斯佳图就评介了美、英、法、德、意、俄等欧美几个主要国家的微观史学研究^①。

再次,从某种意义上说,微观史学也并非一种新近才出现的时尚潮流,它其实早已存在于历史研究中。微观史学背后所蕴含的对于“宏大历史问题”的探究更多源于传统的社会史范式,实际上它也不曾偏离社会科学对于过去真实存在的总体解释。有的微观史家指出,无论文化史还是社会史都只代表了认识过去的一种独特方式,而历史学家需要尝试多种不同的方式;在未来的史学发展中,微观史学希图发挥出融合社会史与文化史不同方法的潜能,超越其间的隔阂与单一视角的局限,对历史活动进行文化意义、深层结构、长时段、全球性以及多重视角的综合分析^②。

总之,通过融合多种视角的方式,微观史学也许可以避免单一视角下可能将过去简单化的风险,而使其复杂性具体地呈现于历史活动主体与现代史家、读者所各自生活而又相互交融的微观世界里。因而,微观史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对抗历史中‘简单真理’的一剂良药”^③。

至于微观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能否将后现代主义视作微观史学兴起的理论背景之

一,这从其中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看颇为复杂。安克斯密特提出,在小写历史层面后现代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不再是历史这棵大树的树干,而是那些附着于其上的树叶;其研究目标不再是综合历史整体,而是揭示历史碎片本身;这也就意味着向本质主义的传统告别,向“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告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微观史学和新文化史所具有的微观分析和叙事方式为抵御“宏大叙事”提供了可能性^④。因此,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以及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被归为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作。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间存在很多分歧,但其最大的共性在于对“宏大叙事”或称“元叙述”(meta-narratives)的反动,如利奥塔就将后现代直接定义为“对元叙述的怀疑”^⑤。因此,放弃或解构“元叙述”在他们看来似乎也就成为判定小写历史著作是否具有后现代性质最重要的指标。另外,美国史家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也都提到,后现代主义及其支持者在拒斥宏大历史的合法性的同时,倡导微观史^⑥。

也有学者提出,微观史学可以被视作对抗“元叙述”的最富深度的学术实验^⑦,特别强调大多数微观

①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óár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②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óár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6-7; Carlo Ginzburg and C. Poni, “The Name and the Game: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 Marketplace”, in 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ero (eds.),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 trans. by Eren Branch,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 8-9.

③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óár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p. 63.

④ F. R.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8, 1989 (2).

⑤ J. F.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xxiv.

⑥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4, p. 228.

⑦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The Singularization of History: Social History and Microhistory within the Postmodern State of Knowledg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36, 2003(3).

史家在研究中从未丧失其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语境,他们的方法能够验证那些宏大结论^①。或者说,微观研究最初的观察是在相对狭窄的维度进行的,但其研究结果却可进一步用于广泛的普遍性概括。然而,更多的微观史家在理论上表现出回击后现代挑战的态度。例如乔瓦尼·莱维就曾指出,意大利微观史家一直致力于反对“语言学转向”以来的相对主义思潮,反对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完全化约为修辞性活动^②。理查德·布朗也强调,微观史学研究植根于对真理的诉求,这使其足以有效地回应后现代挑战^③。

微观史家表现出来的看似矛盾的态度直观地反映了后现代主义在历史领域所造成的不同方向的影响,以及西方史学界回应挑战的不同立场和取向^④。总体而言,微观史家所能接受的是对基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进行微观层面的解构,并试图在此基础上重建对历史总体的新一轮宏观建构。但他们对于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中有关文本、再现、真理等问题的许多观点保持着警惕、审慎甚至批判的态度。

二、微观史学背后的宏大目标

微观史学较早的典型研究实例是卡洛·金兹伯格的名著《奶酪与蛆虫》^⑤。书中刻画了一位生活于16世纪的意大利磨坊主麦诺齐奥的形象,其工作的磨坊实际是当时农村社会性聚集的场所,而他自己则成为新观念的响应者与传播者。在传统农民眼中,磨坊主是受敌视、遭唾弃的对象,甚至在当地的传说中与高利贷者、货币兑换商、收税员一起被称作“撒旦的使者”。这也就是为何他屡次被指控为异端邪说的发布者,而出现在当地的宗教裁判所的原因。根据宗教裁判所的相关记录,金兹伯格重建了麦诺齐奥的世界观:世界是个混沌体,由土、气、水、火混合而成;如同奶酪是由牛奶制成的,蛆虫也产生于其间,它们是天使的化身。由此,作者试图从大众与精英文化两个层面分析麦诺齐奥这套奇妙的世界观的来源,其中更强调了古典与口述传统、唯物主义的大众文化之间的联系及其典型特征^⑥。从金兹伯格的最初尝试中,我们似乎看到所谓微观史学首先是针对那些相对较小的对象,通常仅为单独的事件、一个较小规模的共同体(村庄或家庭),甚或小人物所进

行的深入的历史考察^⑦。换言之,微观史家是以显微镜而非望远镜的方式,聚焦于某些特定事例、人物和情境,并由此做出明显不同于单纯的民族国家史、社会史、断代史、长时段的历史等不同史学范式的研究。

然而,微观史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在看似非重要的小事件、小人物背后通常隐含着远远超出其本身的深层结构、广阔的历史语境,以及宏大历史目标,所不同的是它们采取了以微观叙事、小规模的分析方式来探究那些“宏大历史问题”的可能答案,并试图得出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结论^⑧。而透过这些代表着过去的个体化历史,也可能更好地理解 and 确认它们各自所属的历史结构与范畴。或者说,“微观史学的目的是在小群体层面阐明历史原因”,而这些小群体所构成的社会生活网络系统即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所展开的地方,却又为其他史学方法所忽略^⑨。

上述勾连小历史与大历史的治史目标始终存在于微观史学研究中,近来又颇为微观史家所看重。

①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gjár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21–122.

② 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 95.

③ Richard D. Brown, “Microhistor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 23, 2003(1).

④ 参见拙文《接受与拒斥之间——西方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回应趋向》,《哲学动态》2010年第4期;《挑战与捍卫之间:当代西方史学界对“史学危机”与“终结论”的回应》,《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⑤ 该书意大利文版初刊于1976年,英文版为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by J. Tedeschi and A. C. Tedeschi,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

⑥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pp. 5–6, 126.

⑦ Carlo Ginzburg and C. Poni, “The Name and the Game: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 Marketplace”, in E. Muir and G. Ruggiero (eds.),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 p. 3.

⑧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gjár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5, 17; Richard D. Brown, “Microhistor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 23, 2003(1).

⑨ 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 (eds.),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 p. xxi.

这突出地表现在乔瓦尼·莱维所概括的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具体特征中：第一，虽然坚持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但同时保有从特定事件中进行一般化研究的可能性；第二，在所谓典型性或象征性的个案研究中，探寻的真正目的在于其中可能存在的一般相关问题；第三，微观史并不排斥宏观叙事，对小范围事件或个体人物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一般真理的探索；第四，微观史改变了我们对于现实的感知，试图恢复历史研究的不确定性、不一致性和非线性特点；第五，微观史突出了人类认知的差别及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偏差，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寻求历史真实的方法，而是始终保有继续推进的可能性；第六，微观史在意大利的兴起与政治批判、激进主义运动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七，无论微观史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态度相距多远，也无论微观史与社会史、文化史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它们在总体上所面临的问题和采用的方法性质是一样的^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上七个方面的内容都特别强调了微观史学的理论视野、方法旨趣及其现实性，尤其集中论述了其在研究独特的、典型的、象征性的个体事件或人物中所具有的探索宏观历史层面的一般性、普遍性的可能，以及微观史学试图突破现代史学对确定性、目的论、线性历史本体的固有框架的努力。

此外，有的微观史家还提出其研究重点在于彰显个人的活动、大众的作用对历史的推动力^②。在他们看来，普通人被看作主动而活跃的个体、富有自觉意识的行动者，其历史作用虽然是在微观层面展示出来的，但同样具有整体的意义^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的兴起对历史书写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它正悄然改变着历史学家的治史观念和史学样式，普通大众及其个体化的经验、行为和欲望也愈发引起微观史家的兴趣^④。正如耶尔恩·吕森所指出的，微观史学“让我们更加亲切地了解到普通人在过去的生活”，它提供给我们与当前的生活经验、与现代世界相反的别样图景^⑤。

微观史学的这些特征是以相互联系的状态存在的，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其中对历史的微观研究看似是对微观史学的最直接定义，但事实上却无法单独构成对微观史学较为恰切的概括。相反，微观史学背后所隐含的宏大目标虽然大多未以显性的方式直接地表现出来，却更可能从深层反映微观史学在

整体上所具有的特点。同时，单纯罗列特征、下定义的方法对于全面了解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显然是不够的。倘若要深入探寻它的内在理路及与其他史学范式之间的关系，恐怕还须从有代表性的微观史家的具体实践中领略其理论与方法的意蕴。

三、微观史家的显微镜与历史表现形式

微观史学在重拾历史事件、日常生活、边缘世界、异族社会、个体民众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可能极其微小的研究对象和历史总体之间的关联的呢？这似乎成为微观史学一直遭人怀疑与诟病的核心问题。我们发现微观史家主要是通过显微镜式的观察得以勾连大小历史的，具体通常体现为区域研究与问题中心的方法。

当前的微观史学是以区域空间为基础来呈现历史的，其中又强化突出相关问题及其特殊的处理手段，这是微观史学藉以将小历史与宏大历史问题联系起来的具体途径^⑥。区域研究可更好地将问题集中起来，并做出有效的回答。大量的区域性观察，诸如匈牙利、冰岛、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的微观史学著作，不仅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而且代表了当今历史学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日益广泛的全球性交流。这里我们以几个微观史学的代表性研究为例。

首先，乔瓦尼·莱维有关古典权力的继承研究

① 乔瓦尼·莱维：《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尚洁译，《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

②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jár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p. 5.

③ Brad S. Gregory, "Is Small Beautiful? Micro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8, 1999 (1).

④ 关于当代西方大众文化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参见何平、张旭鹏《文化研究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228页。

⑤ Ewa Domań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p. 146.

⑥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jár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7-11.

体现着社会史与文化史在微观层面的交融^①。在该书所讲述的有关驱魔师乔万尼·巴蒂斯塔·基耶萨的故事中,包含的并非仅是其表面带有神秘色彩的驱邪因素,更多隐匿着17世纪地产交换与继承的权力系统,隐匿着农民对自我身体与精神控制力的渴望。与金兹伯格更多倾向于文化史分析所不同的是,莱维对地方信仰、习俗、制度等做出了较为深层的社会—经济基础阐释,这透露出意大利微观史学研究中社会史与文化史两种路径的分流及其之间存在的内在分歧与张力。但同时也表明,单纯的社会或文化语境分析都带有自身的某种限度,在很多时候正需要微观史家从多种视角探讨,才有可能在小历史中达到重新整合的总体性认识^②。

意大利微观史家在区域研究中还提出了有关“特殊的一般”(exceptional normal)与“一般的特殊”(normal exception)、“变化的规模”(changing the scale)等概念。这主要得益于当他们将定性分析和区域性基层社会史料相联系时,发现那些特殊文献、边缘个案、小规模观察中有可能揭示出大量被隐匿的过去。它们要么以具体而微的特殊形式表征着大范围或宏观层面的历史,要么以改变了的面貌内蕴着某些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或因素,只是因为以往这些来自底层的史料处于“沉默”状态、被无视或被系统地歪曲而无法言说真实的过往^③。

其次,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四代学者也认为微观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他们相关问题的方案之一。勒华拉杜里在其早期著作《罗芒狂欢节》中只写了1580年2月法国多菲内省的小城罗芒十五天的历史^④。这场后来演变为权贵对工匠和农民血腥屠杀的狂欢节,在宏观历史层面被置于16世纪宗教战争的两个重要阶段的相交之处,而在区域的显微镜下则是一个社会下层向城市贵族发起挑战的地方性事件。透过作者看似传统的社会史分析(包括地区人口、社会等级、纳税与税收结构等),却可领略该事件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和有关社会结构的深层信息。因而,狂欢节在这里上演了一场独特而又不失普遍性的“社会戏剧”(social drama)^⑤。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以后年鉴学派受到多方面的批评^⑥。以弗朗索瓦·多斯为代表针对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的入侵和日益细碎的历史研究倾向提出了所谓“碎片化的历史学”,认为单纯描述特殊

个案或企图以抽象的理论将碎片化的历史堆砌成虚拟的总体都是危险的^⑦。在回应上述指责和批评中,阿莱特·法奇和雅克·勒韦尔出版了他们关于1750年巴黎骚乱的研究著作^⑧。该书试图追索当时市民阶层中出现的各种与王室、政府、警察、密探有关的谣言及其与之相联系的个体或群体反应,并逐步与法国大革命前社会公众对王室及政府的不信任感、隔阂直至矛盾、对立意识的形成联系起来。由此可发现,在谣言四起、动荡不安的微观现象之下所隐匿的是当时法国君主制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的丧失。之后,勒韦尔还从理论上回应道,微观与宏观研究之间是互补的,它们对历史知识的影响只是在所选取的分析层面上的差别;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不同层面参与了历史进程的创造,因而以他们

① 该书意大利文版初刊于1985年,英文版为 Giovanni Levi, *Inheriting Power: The Story of an Exorcist*, trans. by L. G. Cochran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② 参见 S. Cerutti, “Microhistory: Social Relations versus Cultural Models?”; Renata Ago, “From the Archives to the Library and Back: Culture and Microhistory”, both in A. M. Castrén, M. Lonkila and M. Peltonen (eds.), *Between Sociology and History: Essays on Microhistory, Collective Action, and Nation-Building*, Helsinki: SKS-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 2004, pp. 18–20, 41–44.

③ 参见 Carlo Ginzburg and C. Poni, “The Name and the Game: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 Marketplace”, in E. Muir and G. Ruggiero (eds.),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 pp. 7–8; C. Ginzburg, “Microhistory: Two or Three Things That I Know about It”, *Critical Inquiry*, Vol. 20, 1993(1); 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94–97.

④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罗芒狂欢节》,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中译本是根据1979年出版的法文版翻译的。

⑤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ujár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p. 29.

⑥ 参见 Joseph Tandler, *Opponents of the Annales School*,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⑦ 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242页。该书法文版出版于1987年。

⑧ Arlette Farge and Jacques Revel, *The Vanishing Children of Paris: Rumor and Politics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by C. Miévil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为主角的历史研究就必然产生不同的聚焦方式^①。

还有一些法国学者借用“变化的规模”概念说明,不是研究者发现了存在于不同规模历史之中的人类活动,而是他们本身就同时出现在微观与宏观的背景之下,并构成了其社会活动的网络系统;微观现象并不比宏观现象更具历史真实性,只是它们存在的层面不同;研究者改变观察的规模是为了获得新的洞察过去的视角,看到过去以不同方式相互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有可能补充已有的认识^②。

美国的微观史研究是在更为广泛和宽松的意义上进行的,更多被称作新文化史。娜塔莉·戴维斯关于马丁·盖尔的故事和16世纪法国史研究,带有明显的微观史研究的特征^③。罗伯特·达恩顿在《猫的大屠杀》中所运用的“事件分析”(incident analysis)方法^④,即对微观性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度观察。这也表现出微观史学的倾向,同时又引入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他们所普遍采用的“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方法的共同点在于:“从小处得出大结论,但这是基于高密度编织的事实之上”^⑤。

从历史表现形式而言,微观史学的一个极易识别的特征在于历史学家的文本风格和叙事方式。虽然叙事是所有历史写作的共性因素之一,但在微观史学研究中可称得上起到了支柱作用。金兹伯格在谈到微观史学的实验是如何综合了多种因素而建构起来时,将辨识研究对象及其重要性、精心设置分析范畴、用以传达给读者的历史体裁与叙事形式三个方面并举^⑥,可见叙事方式在微观史学实践中的特殊地位。莱维则更直接地认为微观史学研究的关键“在于论述方法”,他们所尝试的是一种新的叙事方式^⑦。这一历史叙事与专业史家的既定规则并不相互冲突,它所冲击的只是那些一般性、简单化的因果论和已然僵化的目的论模式。微观史学更希望通过重构或还原某个特定时段、个体、地区状况的过程,将其与当地复杂的生产生活、社会形态与环境紧密相关的部分揭示出来。这一叙事方式的具体实施似乎包括两种截然相反的路径:一为隔离法,将研究对象有意从所处的各种关系和背景下抽离出来,完全置于真空条件下进行实验性研究;二为聚焦法,即研究处于复杂背景与矛盾中、在选择与限制之间寻求夹缝中生存的特殊个体。

158 天津社会科学 2016年第1期

总体而言,微观史学著作大多采取的是更加文学化、个性化的小说家风格,而非社会科学化的语言类型和表达形式。作者常常会以多重视角展开故事情节,以明显带有偏爱的手法深入前景描写,最后总以非同寻常或开放性的述说结尾。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是史景迁的多部中国史著作,其中尤以《王氏之死》最为知名^⑧。但我们往往被作者的文采所吸引,反而忽视了其文学形式之下所隐含的对社会状态和结构的揭示。透过那些小人物的命运和戏剧性事件,更应看到的是他们与大历史相互勾连的方面,而其叙事方式恰恰是达成这一勾连的重要途径。如果说分析与叙事是历史表现的两种基本形式,那么它们无疑在历史知识的建构上发挥着不同功能。叙事似乎更生动逼真地以一种离散或聚焦的方式表现着过去存在的过程、状态、网络乃至整体。

四、微观史学的困惑和发展趋向

在微观史学研究中引发争议最多的是它有可能导致历史学进一步碎化,进而使历史知识蜕变为记忆的碎片,难以继续维系其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微观史学所运用的个体化历史叙事又常常浸润在某种文学式的虚构想象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历史知识的真实性藉以构建的基础。进入新世纪,

① Jacques Revel, "Microanaly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in J. Revel and L. Hunt (eds.), *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trans. by Seuil and Gallimard, New York: New Press, 1996, pp. 15-26.

② Bernard Lepetit, "Architecture, Géographie, Histoire: Usages de l'échelle?", *Genèses*, Vol. 13, 1993.

③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5, pp. 75-104.

⑤ C.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28.

⑥ C. Ginzburg, "Microhistory: Two or Three Things That I Know about It", *Critical Inquiry*, Vol. 20, 1993(1).

⑦ 乔瓦尼·莱维:《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尚洁译,《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

⑧ Jonathan Spence,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78;史景迁:《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李孝悌、李孝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人类对地球共同体未来命运的关注和对普世价值的重新思考,在历史领域突出表现为全球史的兴起,而这恰恰有可能为微观史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新的契机。

(一)碎化与虚构

微观史家如果坚持从小历史的叙事中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或结论,那么通常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从细节的汪洋大海中寻求偶然的发现;二是以某种先验的预设进行有选择性的研究。事实上,微观史学的实践与混沌理论有关。混沌理论认为一切事物的原始状态都是一堆看似毫无关联的碎片,但之后这些无机的碎片会有机地汇集成一个整体,因此碎片成为混沌的中心;碎片是有着复杂几何结构的系统,当它们被放大时就展现出完美而相似的原始结构;这种“自我的相似性”在一定尺度下是对称性的,重复出现或模式套模式的;而这一碎片化特征不仅是数学、无生命体所具有的,也是生命世界所属的性质^①。微观史学则假设了历史领域也是此类混沌与碎片的延伸。于是,微观史家需要长期致力于某种相似性现象的研究,并力求识别出这些碎片中所隐含的整体性结构或普遍性意义,即使最终结果表明它们之间并无本质关联,只是作为话语实体或历史表现形式而存在于历史学家的想象之中。

由此,我们看到微观史学似乎建立在对某种相似性现象的推演基础之上,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些相似的碎片是否构成整体状态的基本粒子或以局部形态体现整体的基因化特征。同时,微观史学看似基于碎片的研究,其实质和目的却并非仅止于个体化的叙事而已,更为深层的微观研究则需要展示出群像、群体的力量、表征等,据此才有可能找回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早已剥离于整体的碎片,并如拼图般复原其所属之格位。这类微观史学研究的代表作如马格努松对冰岛日常生活史与大众文化史的研究。作者试图将社会史与微观史研究方法相融合,将单一个体与普通大众群体性分析相互勾连,并坚信社会史的结构性宏观视角可以为微观史研究带来新的启示^②。

然而,问题在于,微观史家并不能确保所聚焦的碎片必然带有某种典型性或整体的普遍意义,甚至引起他们关注和兴趣的经常是一些非典型性的个体化历史。诚如金兹伯格自陈,“大量的传记研究已表

明,在一个本身缺乏重要性并因此而具有代表性的不起眼的个体身上,仍然有可能像在微观世界中那样,追踪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个社会阶层的特性”,但对麦诺齐奥而言却并非如此,因为“他不能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农民”^③。

同时,一些微观史研究实验性地运用了想象和虚构的方法,而且这种运用是有意识的尝试,甚至可以视作将历史真实与想象之间进行某种联结性思考的成果。这一方面是由于微观史家所掌握的史料的欠缺与片面,另一方面也部分源于脱离了经验化的“宏大叙事”架构之后,单纯依赖“证据范式”(evidential paradigm)建构微观事实的局限^④。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迪莫斯所著《未获救的受掳者》讲述了一个在北美18世纪初殖民战争中被印第安人掳走的七岁小女孩及其家人的经历^⑤。该书利用原始史料着力分析了战争背后的文化冲突,试图以想象的虚构来解释一个出身英国清教徒家庭的女孩如何在文化身份上转变为真正的印第安女人。

在这方面更加典型的是英国史家西蒙·沙玛所著《死亡的确切性》。书中建构了两个人的死亡故事,一个是1759年死于魁北克战役的詹姆斯·伍尔夫将军,另一个是1849年被哈佛大学教授谋杀的乔治·帕克曼。作者在两部分的叙述中利用了诸如信件、报刊、战争档案记录、庭审记录、法庭卷宗等一手材料,但却仍在结尾处坚称:“这是一部对历史事件进行想象性研究的著作”,其中存在着“纯粹的想象虚构”。因为它大部分是依据战争和事件的幸存者的当代文献来加以建构的,尤其是当事人之间的对

①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gjár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p. 63.

②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The Continuity of Everyday Life: Popular Culture in Iceland, 1850-1940*, PhD thesi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USA, 1993;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Wasteland with Words: A Social History of Iceland*,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0.

③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p. xx.

④ 参见 Carlo Ginzburg, “Clues: Roots of an Evidential Paradigm”, in Ginzburg,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trans. by J. Tedeschi and A. C. Tedeschi,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96-125.

⑤ John Demos, *The Unredeemed Captive: A Family Story from Early America*, London: Macmillan Papermac, 1994.

话完全是依靠对史料的理解编制出来的^①。

(二) 历史经验与全球史

新世纪之初,安克斯密特提出“历史经验”理论,将重新概念化的“经验”作为过去与现在之间“真切”的关联所在,也是触摸历史、展现在场感的聚合地带^②。这一理论变化促使微观史学也急需在个体经验、片断性的微观叙事之上重新思考那些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体验或“宏大历史画面的问题”^③。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氛围中,地方化欧洲和去中心主义思潮日益渗透进历史领域,微观史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史研究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矛盾的两种史学范式,实质上如果不将微观研究与宏观视角截然对立而均把它们视作可以有机结合的历史探索的不同路径,那么全球史就不会成为微观史学发展的坟墓,相反,还会为其带来回答“宏大历史问题”的新契机^④。

上述微观史学发展趋向的代表性研究,如金兹伯格从个体视角理解 18 世纪殖民化过程的研究^⑤,劳拉·普特南尝试以群体传记(protopography)研究 16 世纪和 20 世纪作为大陆间联系的大西洋史^⑥,娜塔莉·戴维斯对 16 世纪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所做的跨文化研究^⑦,以及卜正民从画家维梅尔的几幅画出发揭示 17 世纪全球贸易网络的迅速发展等^⑧。这些研究都试图把某些特定的个体或群体的案例置于世界历史的宏大画面中,或者回归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与结构时间来加以考察,以微观分析、微观史的经验来重构全球视域下的人类历史。

再有,近年美国学者欧阳泰关于 17 世纪台湾历史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⑨。他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事件置于全球范围的跨文化关系中加以研究,不仅指出当时推动欧洲扩张的非科技性因素,也着意论及东方军事智慧的价值,以及自然因素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同时,他还注意到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与荷兰人、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密切往来,来自于其母亲的日本血统和幼年所受到的武士教育,以及战争中双方对待异己文化投诚者的态度等诸多跨文化因素。这一对传统历史事件的全新解析带有明显的微观全球史的特征。

综上所述,伴随微观史学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关于历史学“碎化”的讨论,我们发现以个体化、事件性、区域性、叙事化为表征的微观史学与宏观历史之

间并非具有必然的矛盾,相反,真正成功的微观史研究似乎总可以从不同规模、多重维度、各类语境中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之间本质性的关联。这其中可能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融合,将结构性、长时段与全球化过程具体化。对于微观史家而言,探察蕴含着某种普遍性、整体性、全球性的个案,可以避免微观分析与历史叙事陷于模式化、简单化的目的论陷阱,从而使看似单独的、特殊的历史事物在显微镜下呈现出宏观历史的结晶状态。这可能正是构建历史知识系统及其历史观念的理想之路。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项目号:15LSA00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邓京力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 贞

① Simon Schama, *Dead Certainties: Unwarranted Specula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1, p. 327.

② Ankersmit, *Sublime History Experi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F. R. 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杨军译,东方出版中心 2011 年版。

③ Ewa Domanska, “Beyond Anthropocentrism in Historical Studies”, *Historiein*, Vol. 10, 2010.

④ 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áj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p. 72.

⑤ C. Ginzburg, “Latitude, Slaves and The Bible: An Experiment in Microhistory”, *Critical Inquiry*, Vol. 31, 2005(3).

⑥ Lara Putnam, “To Study the Fragments/Whole: Microhistory and the Atlantic World”,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39, 2006(3).

⑦ Natalie Zemon Devis, *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⑧ 卜正民:《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刘彬译,文汇出版社 2010 年版。

⑨ Tonio Andrade,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欧阳泰:《1661, 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陈信宏译,九州出版社 2014 年版; Tonio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Tonio Andrade, “A Chinese Farmer, Two African Boys, and a Warlord: 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1, 2010(4).